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上海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2

1962.8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二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編輯說明

一、《中国现代文艺資料丛刊》是为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研究提供資料的丛刊；《丛刊》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思想斗争、作家作品等各个方面的回忆、訪問、調查、整理、选輯、編目、考証等各类資料，及与此有关的文章。

二、《丛刊》分輯連續出版，供应范围仅限于确有研究及参考需要的团体及个人。

供应范围如下：

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

作协会员及其他中央和省、市的学术团体成员；

大学中文系及其他文科院系助教以上干部；

报、刊、出版社編輯、記者；

文化、艺术、学术单位的研究人員和科以上干部；

各省、市及中等以上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館、紀念館以及文化学术单位的資料室；

其他相当于以上所列的单位或个人。

三、《丛刊》所发表的文章和資料，大部分是未定稿，凡有必要出版单行本的，发表后经过征求意见及补充、修訂、核实，在一定时期以后，将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資料丛书（甲种）》內出版，或采取其他方式出版；在未出单行本前，即未經补充、修訂、核实前，請勿直接引用。

四、《丛刊》每年出版四輯左右，即約每三个月出版一輯；每輯二十至三十万字。

目 次

創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 ····· 郑伯奇 1

創造社期刊介紹 ····· 陈中朝 22

創造社期刊目录 ····· 上海古旧书店 39

魯迅著譯系年目录(下) ····· 紀 文 93

《胡也頻选集》未收論文

和作品选刊 ····· 余仁凱选輯 211

題記(211)

第一部分 論文、杂文

1925 年 “学者說話不会錯?”(224)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225)
嗚呼中国之一般民众!(226) 无聊的通信(一)——金蓮
的討論及其他(227) 无聊的通信(七)(229) 我希望想
替中国劳动階級做些好事的人們注意这一点(230)

1928 年 《捉狹鬼》序(231) 写在篇末 (附: 一个观念) (233)
这一月的开头(234) 写在《詩稿》前面(236) 編后題
記(237)

1929 年 編后附記(238) 卷首題辭(239) 編后(239)

1930 年 《到莫斯科去》序(240)

第二部分 小說、戏剧

1924年 梦后(241)

1926年 漂泊的记录(一个片断)——浦口和南京(244) 械斗(247)

1927年 鬼与人心(252) 登高(262) 猫(269)

1928年 往何处去(278) 坟(286)

1930年 黑骨头(290) 黑骨头(294)

1931年 同居(297)

殷夫烈士和《列宁青年》·····丁景唐 陈长歌 302

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

的意见——来信选登····· 319

一、姜德明(319) 二、何公超(321) 三、徐迟(322)

四、雷石榆(322) 五、臧克家(324) 六、黄秋耘(325)

七、葛一虹(326) 八、毛星(326) 九、楼适夷(328)

十、康濯(329) 十一、王瑞(333)

資料工作簡訊(五則)

北京图书馆出版《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92) 上海鲁迅纪念馆积极开展鲁迅研究資料的整理工作(86) 《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发稿(334) 《歌謠》周刊影印本将于年内出版(301) 《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初稿)》即将出版(71)

編后記····· 335

創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

郑伯奇

1927年冬，在日本的創造社成員先后回国，和原在上海的成員一起，开始了創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

大革命时期，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同志都正在日本留学。朱鏡我比較早一期升学，已在东京帝国大学經濟科三年級。其他三人都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彭康讀哲学科，李、馮二人同在文学科，初梨讀法文学，乃超讀英文学。他們三人是同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預备班毕业后分发到不同的高等学校，毕业后又同时进大学的。他們中間，初梨和我認識較早。远在創造社未成立以前，我去东京訪問田汉同志的时候，田汉就約我同去看过他。那时候，他已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为爱好文学，不愿学工科，終於半途退学，考入一高。乃超是橫滨华侨子弟，在那里讀完小学和中学。他們两人在日本時間相当长，日本話讲的非常流利，对于日本文学和当时世界文学情况都很熟悉。那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盛行，大学和高校的学生頗有参加者，他們也受了相当的影响。在这以前，他們两人都在《創造月刊》上发表过作品。初梨的充滿人道主义感情的剧本，乃超的富有异国情調的抒情詩，都受到同人的重視和讀者的欢迎。接触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学习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論以后，他們的思想起了变化，主张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應該轉变方向。彭康和朱鏡我則是在学习自己的专业中，学习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朱鏡我在东京，见面的机会較少；他們三位进京都市大时，我正在大学三年級，几乎朝夕相见。初梨和乃超对于我以前发表的《国民文学論》，曾提出过好意的批評。他們也曾通过我对創造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和希望。大革命时期，我去广州，他們热

情地送別；我由廣州重到日本，他們又很熱情地來看望。他們非常希望了解大革命的真相。我將我所見所聞的情況告訴了他們。他們特別關心創造社，希望創造社能轉變方向，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了解不多，但也受過一點影響，因而表示同意。我們為此開過幾次小會，朱鏡我特別由東京來參加。他們希望我把這些意見帶回創造社，和沫若、仿吾、達夫商量具體辦法，儘快地干起來。我就這樣帶着大家的意見和希望，乘船回國。

不料，在回國途中，“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了。我坐的是直達香港的太平洋航輪。船靠上海楊樹浦碼頭的那一天，正是蔣介石反動派大肆屠殺上海革命工人以後不久的時候，上海街面籠罩着異常恐怖的气氛。到達香港，從報上看到反動當局也在前一天發動了所謂“清黨”的血腥鎮壓。我急于想知道在廣州的朋友們的安危，便硬着頭皮乘小火輪船去廣州。上岸後，我先冒險去昌興新街的創造社門市部，見到張曼華同志，真是又驚又喜。從他那里，知道仿吾仍在黃埔，王獨清仍住在東山，我的心才象一塊石頭落了地。當天下午，我去東山，在大街上遇見王獨清。他一見我就大喊大叫：“人家都要走了，你現在來干什么！”我感覺到又吃驚又為難，沒有回答他，只是跟着他同到他的住處。他結結巴巴地告訴我許多朋友犧牲的慘況，我聽了不免感到心頭沉重。當晚就宿在他那里。第二天，聽說晚上要挨門挨戶地清查，這裡實在待不下去了。那天傍晚我就由一位日本朋友山上知義陪同到沙面去暫住。他是日本聯合通訊社記者，愛好文學，和創造社同人很接近；以後調到上海，當創造社轉變期間，還和我們有來往。他也認識魯迅先生，曾以林守仁的筆名翻譯過魯迅的小說。我在他那里住了幾天，白天去創造社門市部，和仿吾會面，商量以後的行動，決定先後去上海。我在廣州待不住，決定先走。因為火車檢查很嚴；我便搭乘一家外國船去香港。在香港碼頭上，一個英國警察帶着一個中國翻譯，嚴密地檢查行李。我穿着日本學生制服，自稱來廣州游歷，那個英國警察似乎還不大懷疑，偏偏那個中國通事翻出我的日記，多方盤問刁難，多虧旅館接客的很機警，叫我拿出幾塊港幣，由他塞進那個中國通事的袖筒，他便不

再追問，得以蒙混過去。当晚我就由那个接客的帶到一家豪華的旅館住了一宿。第二天趕快搭乘太平洋航輪直赴上海。

那正是反動派瘋狂屠殺的時候，白色恐怖非常嚴重，特務匪徒到處橫行。因政治關係逃到上海的人往往誤入羅網。有的一靠到碼頭就失蹤，有的剛進旅館就被捕；而旅館又往往是特務的巢窟，危險性更大。我到上海後，既不愿投旅館，又不敢貿然去創造社出版部，只好帶着行李去找一位曾在國民二軍作過事的老朋友周祖武先生。就在他住的公寓里暫時住下來。

住定以後，我先去找創造社出版部。這時候，出版部已搬在北四川路橫浜橋附近的一個叫麥拿里的半截胡同里，工作人員已經換了一批新人。（他們不認識我，當我道了姓名之後，都很熱情地接待我。）郁達夫不住在那里，來的時間也不一定，我去愛文義路他大哥家里找他，沒有遇到。他知道我到了上海，就來公寓看我。他簡單地告訴我改組出版部的情况；對於周全平等入深表不滿。我也告訴他廣州朋友的情况。因為仿吾不久就要回來，關於出版部的問題，我們便沒有深談。

仿吾回上海以後，我就搬到創造社出版部附近的北四川路，大家討論創造社的發展前途。達夫整頓出版部的簡單化的做法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意見。達夫對此頗為憤懣，終於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這是深可惋惜的。

達夫回上海整頓出版部本來是大家一致同意的。但是他回到上海以後的種種作法都給創造社帶來了困難，引起了大家的不滿。他一回到上海就在《洪水》上發表了《廣州事情》一篇揭露廣州政治黑幕的文章，本來，廣州方面，自三月二十日事變後，蔣介石的反動面貌已經暴露出來，革命勢力已經引起警惕；但當時北伐正在進行，廣州政權尚未公開和革命勢力決裂，因而也就不便公開反對它。達夫在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勢力範圍的上海，發表攻擊廣州政府的文章，客觀上形成對革命的不利。達夫對廣州的政治局勢積有憤慨，回到上海以後覺得可以盡情發揮一下，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可能沒有考慮到這篇短文會發生怎樣的政治局勢。沫若同志負責北伐軍的政治宣傳工作，對他

的文章怎能不感到为难？文章又发表在創造社一度被北洋反动軍閥封閉之后，自然会引起社会上对創造社的怀疑。我們留在广州的同人对达夫的这种作法也感到詫异和不满。仿吾即时写了一篇反駁的文章，仍送《洪水》发表。这样就形成了达夫和創造社其他同人的一次公开分歧。其次，达夫整頓出版部的作法也使人感到意外。原来大家希望他清查年来出版部的情况，糾正錯誤，改进业务，編輯《創造月刊》，給将来发展作好准备。而他事前未和大家商量，就全盘改組，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意见。出版部曾經反动軍閥一度封閉，有的同志被捕坐牢，有的同志逃往武汉参加北伐，留下来的同志坚持斗争使出版部得以恢复，而这些青年都和創造社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出版部的成立又多由他們筹划奔走才打下基础，如今把他們全部清洗出去，大家固然不同意，沫若同志更感觉不妥。达夫改組出版部以后，半年間《創造月刊》只編印了一期，但他却参加了新月社的編輯會議，这就更引起大家的怀疑和不满。因此仿吾約达夫来和大家一起討論社务，达夫认为大家有意对付他，便自动地脫离了創造社。他表现得非常坚决，把他的集子全部移交北新书局出版。我們虽然感到痛心，但觉得事情已难挽回，只好尊重他的意志。不过，以后在左联时期和抗战时期达夫仍然和我們站在一起，最后由于爱国活动，在南洋惨遭日本法西斯的毒手。他的一生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我們对他始終怀着深切难忘的忆念。

达夫的脫离使創造社失去了一個創始人和一个重要作家当然是深可惋惜的。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創造社依然向前发展。經過一个时期的酝酿，創造社終於进入后期的活动。

大革命失敗以后，各地反动势力大兴党獄，疯狂逮捕屠杀，全国騷然。不少进步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毅然决然参加革命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投入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同时，許多进步作家和革命知識青年从各地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蔣光慈、段可情、黃白薇等先后都来了。創造社成了大家經常出入或临时安身的地方，一时頓形活跃。不久，魯迅先生也由广州来上海。年底前后，沫若同志参加南昌起义，行軍潮汕以后，也經由香港回到上海。我們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

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政治革命暂时受了挫折，先从文艺战线上重整旗鼓，为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准备条件，岂不很好吗？蒋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我们都很高兴。沫若也表示非常欢迎。我为此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先生。这计划曾由鲁迅和沫若领衔发表过启事。后来因为仿吾和在日本的创造社同人另有主张，这计划没有实现。

我们在上海和鲁迅先生谈联合计划的时候，仿吾已去日本。他去日本是想和初梨、乃超等同志商谈今后创造社活动的方针的。我和仿吾谈过在日本的同志们主张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见，仿吾很兴奋。我们本来就觉得创造社的人力单薄，达夫离开以后，更希望有生力军参加。初梨、乃超已经发表过作品。彭康、镜我研究理论有成就，现在大家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这对于创造社的前途有很大关系，仿吾决定亲自去日本跟他们谈谈，以便制定今后的活动方针，请他们回来共同来搞。我和他们先后同学几年，知道他们在创作方面和理论方面各有专长，更希望他们回来，充实创造社的力量。仿吾要去日本和他们当面谈谈，可说是我们上次在京都交换意见的结果，我非常赞成。不过当时他们都在读大学二、三年级，要回国就非半途退学不可，这是我们担心的一点。不料，仿吾到日本和他们商定了计划以后，大家都愿意退学回国。仿吾来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都很高兴，以殷切的心情等待他们。沫若和我都同意仿吾的新计划，以前酝酿的联合计划因而无形作罢了。不过此事未向有关各方面作妥善交待，当时由于我的疏忽，遂致引起了许多误会。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歉仄。

1927年底，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和李铁声五位同志回到上海（李铁声同志原名李声华，三高理科毕业后，刚转入大学文科一年，激于革命热情，也自动退学，一道回来了）。我们在宝乐安路纪家花园找到一座清静的小院落，让新回来的同志一起住在那里。沫若同志在

他秘密的环境也和大家见了面，交换了以后工作的意见。现在只等仿吾一回来，就着手改革，开始創造社后期(也可以說是第三期)的活动了。

1927 年底到 1928 年初，正是反动势力疯狂镇压、革命斗争异常艰苦的时期。上海在所謂“狼虎成群(人民群众送給特务头子杨虎和陈群的綽号)”的血腥镇压之下，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和进步工人惨遭屠杀。对于文化界的活动，特务們早已側目而視，伺机摧残。为了应付这样严重的局面，我們决定采取两道防綫。一方面让新发刊的理論性刊物《文化批判》，担負起宣传馬列主义学說的任务，战斗在第一綫。《創造月刊》則利用历史关系，仍保持文学刊物的特色，将重点轉到文艺理論和批評方面，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为了隱蔽，宣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逐漸改变面貌。以新回来的同志为主力办好《文化批判》。創造社的旧同人加上蔣光慈、段可情等同志繼續发表作品，充实《創造月刊》。初梨和乃超等同志，除在《文化批判》上写稿以外，仍在《創造月刊》上发表創作及理論批評文章。最初计划的分工大致如此。《創造月刊》第九期上发表了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創造社就这样表明了方向轉变的態度。在《文化批判》創刊号上，仿吾的《祝詞》說“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这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可以說明創造社后期活动的基本特点。的确，当初大家所想作的是在广大知識分子中間宣传馬列主义学說，而在文艺界中則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創造社以一个文学团体，自发地搞起这种启蒙运动，因而对于文艺界，特別对于进步的文学团体，所发生的影响就比較直接而深刻。这时，已有的文学团体也紛紛发生轉变或分裂，之后，新的左翼文学团体产生了，广大文艺青年傾向于革命文学运动，甚至直接投身革命斗争。文艺界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一时期，創造社的活动是相当紧张的。新回国的同志中以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四位出力最多、貢獻最大。原有的成員中，沫若和仿吾仍然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他同志也都作了相应的工作。只有

張資平和王獨清起了破壞作用，這在后面將另加敘述。

如前面所講，新出的《文化批判》由新回國的同志担負編輯撰稿的責任，而《創造月刊》的改變面貌也主要由於他們的努力。初梨和乃超負責文藝理論和批評，彭康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饒我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理論、分析國際形勢。李鉄聲也作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翻譯和介紹工作。他們的辛勤工作對於進步的知識青年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對於當時的文藝界尤其發生了強烈的影響。

在創造社的后期活動中，沫若仍然發揮了領導作用。他用麥克昂等筆名所發表的論文和創作，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奔放的文風和犀利的見解受到文藝界的注意，根據多年來的鬥爭經驗和文藝界的實際情況，對於革命文學的見解和對於當時各文學流派的評價，他和新歸國同志有不同的意見；而這些意見，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切合實際的，因而也是正確的。可惜那時候他所處的環境不能和大家充分交換意見，使這些意見得到貫徹。假使他的意見事前能使大家充分了解，和魯迅的一場筆戰也許可以不致發生，或者不致發展到當時那樣的情況。關於這件事，后面還要講到。沫若的隱蔽活動終於為反動派所發覺，不能再呆下去了。幸虧由最近逝世的內山完造設法，深夜搭乘日本貨船秘密駛往日本。從此，他再沒有能夠直接參加中國革命文學活動。但在十年的亡命生活中，他不僅在中國古代歷史和古代文化方面作了廣泛的研究，獲得了輝煌的成績，而且在中國革命文學運動方面仍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並團結、培養了一批新生力量。直到七七事變以前，他才逃出日本特務的監視，化裝返回祖國，參加了抗戰。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這裡不再多談。

在創造社后期活動中，仿吾担負了主要責任。他一方面總攬社務，一方面還經常給《文化批判》寫卷頭語，並用石厚生等筆名發表評論文章。此外他還須要做一項麻煩的工作，就是對付張資平和王獨清的掣肘和搗亂。他為人忠厚、木訥、直率，應付這種複雜的內部問題，的確煞費苦心。以後，他赴法國留學，在出國之前，對創造社的各項工作，還作了周密妥善的安排。

其他創造社的成員差不多都积极的参加了这一时期的活动。有些参加过实际革命斗争的同志，脱去了戎衣，加入到創造社的革命文学队伍中来。跟創造社有关系的作家也有不少人参加了这一运动。下面我将谈谈几位关系較深贡献較大的同志。

在这以前，由国外归来参加創造社的段可情同志，曾和我一道去见过魯迅先生，贊成共同办一个进步的文学刊物。后期活动开始后，他繼續在《創造月刊》上发表創作。他曾先后留学过苏联和德国，对于苏联和德国的无产階級文学，知道的較多，他常常談到苏联的白內宜、叶賽宁和馬雅可夫斯基，也談到德国革命作家貝希尔、凱賽尔曼和昂利希·曼等人。他向我們介紹过凱賽尔曼的名作《隧道》，引起我們很大的兴趣，我們都希望他翻譯出来。由于当时运动的情况，我們沒有作好具体安排，使他去作这有意义的工作，回想起来，不免还有点遺憾。

这时，从实际革命战争中脱险出来，加入創造社的活动的有阳翰笙、李一氓和苏怡等同志。阳翰笙同志本名欧阳继修，当过广东黄埔軍校入伍生部的教官兼秘书主任，和我那时就認識。以后他到武汉，参加总政治部，和沫若同志一道工作。李一氓同志原名李民治，也是在武汉总政治部工作的。他們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沫若一道南下潮汕，然后輾轉来到上海，参加了創造社。当时，創造社正考虑办一个短小精悍的刊物，以便灵活作战。这个战斗性的刊物就由翰笙和李一氓共同負責，取名《流沙》，用以紀念潮汕一个地方的重要战役。翰笙当时化名华汉，除編輯这个小型半月刊外，还在《創造月刊》上发表作品，并由創造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暗夜》，以后，他参加戏剧、电影活动，才用阳翰笙这个名字。这些活动是大家所熟悉的，不用多說了。

苏怡同志原名舒子怡，曾在广东黄埔軍校工作。大革命失敗后，他几經輾轉，才来到上海，加入了創造社。他主要搞出版部的工作，出版部被封时，他在场幸免。接着又在出版部的后身江南书店工作。以后江南书店也遭反动派封閉。他化名苏怡写电影剧本，进入天一公司。从此他一直从事电影工作。

蔣光慈在《文化批判》刊行之初，还和創造社密切合作，在《創造月

刊》上继续发表作品，并由创造社印行他的新著。不久，他和錢杏邨（阿英）、孟超等同志创办“太阳社”，另出《太阳月刊》。他们曾和初梨等同志有所争论，但和创造社仍然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和创造社关系密切的还有“我们社”，这是林伯修（杜国庠同志笔名）和洪灵菲、戴平万共同组织的。他们办了一个月刊，就叫《我们》。有人以为《我们》是王独清办的，那是一种误会。王独清可能在创刊号的重要版面上发表过文章，其实并无什么特殊关系。

当时，各式各样的文学刊物风起云涌，纷纷响应革命文学运动。团结在创造社周围的一批青年作家编印了小型刊物《畸形》，由创造社出版部印行。其他如“光华”、“现代”等书店也争先恐后地刊行新刊物，先后出版的有《洪荒》、《战线》、《澎湃》、《戈壁》、《现代小说》、《摩洛哥》等，这些刊物都提倡革命文学，和创造社站在一条战线上。这些刊物的主持者，有参加过实际斗争的革命战士，有热心革命的知識分子，当然也不免有一些凑热闹的投机分子。在创造社和鲁迅的笔战中，他们大都站在创造社一边。但也有人推波助澜，起了不良作用。当白色恐怖猛烈来袭的时候，这些刊物都遭受摧残。在这种形势下，个别投机分子甚至摇身一变，投到反动阵营，向革命文学进攻了。

现在谈一下创造社和鲁迅先生的笔战。这场笔战是由创造社作者的几篇文章引起的。乃超和初梨的两篇论文特别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反击，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载《文化批判》创刊号）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二号）那篇论文里，不仅批评了鲁迅，也批评了郭沫若和蒋光慈。此外，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那篇文章里也触犯了鲁迅先生。平心而论，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缺点。对于当时文学界的分析和对于当时著名作家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特别是对于鲁迅先生五四以来的战斗成绩重视不够，而批评的态度又不够严肃，这些都是引起鲁迅先生反击的原因。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引起那样一场严重的论战。论战开展以后，《太阳》、《我们》以及其他刊物都纷纷加入创造社这一边。这样就使鲁迅先生感觉到受

了“围剿”。其中某些作者推波助澜，更使論战发生了偏差。幸亏党及时加以糾正，这场論战才告結束。现在回想起来，这场笔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运动所以发生这种偏差，我觉得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因为当时革命斗争非常尖銳，人們无暇分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况创造社搞起革命文学运动，完全出于自发，最初没有得到党的正确领导，錯誤更是难免的。其次，我們出国时间較长，对于当时国内文学界情况不太了解，而又缺乏調查研究，因而在国内文学界的分析、评价方面不能完全正确。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场可以避免的笔战就不免发生了。

在这里补叙一下沫若同志的意见也許还是必要的。在对鲁迅先生展开批評之初，沫若就曾为此提醒过初梨。在以麦克昂的笔名发表的《留声机器的回音》一文中，他以为語絲派的文学家是“不自觉”，“或者有一部分（这里无疑地包括鲁迅——笔者）是觉悟而未彻底”，“实践上”“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他揭露新月派的徐志摩“才是有意识的反革命派”的“文学小丑”，“不仅在文学上是反革命，他所有一切思想行动都是反革命。”沫若的这种認識是他从长期斗争实践中得出的結論。历史証明，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小丑一直是革命文学、进步文学的最頑强的死敌。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虽然还显得不够全面、不够充分，但他明确地告訴我們要分清敌友。創造社和鲁迅的論爭，按照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原則来看，應該是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經過批評而达到团結，而不應該发展成为无情的斗争。可惜論战开始，执笔的人就没有很好地掌握分寸，又有一些人从旁推波助澜，以致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严重的論战。这一論战我没有参加，主要因为自己曾和鲁迅先生商談过合作，不愿介入，并不是自己有什么明确的思想認識。

总之，这次論战是有缺点的。但它却起了积极作用。論战的展开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注意，特別对文学青年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經過这次論战，鲁迅先生研究介紹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論，翻譯苏联文学作品，集合革命青年发刊

鼓吹革命文学的杂志，因而加强了革命文学的力量。这样就給革命文学陣营的团结創造了有利条件。1930年初，在党的领导下，魯迅先生和創造社、太阳社等团体的成員联合起来，組織了“左翼作家联盟”。

創造社的活动不久就連續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和摧殘。《文化批判》出至第四期，即被禁止，第五期封面改用《文化》，发行仍有困难，只得暫停。以后改为《思想》，发行五期，又被迫停刊。后来，由“江南书店”刊行的《新思潮》、《新思想》（《新思潮》第七期改名）虽和《文化批判》《思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性质已变为社会科学的专门刊物，与“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关系更多。《流沙》半月刊只出了六期。《畸形》则仅仅出了两期。为了适应运动开展和斗争尖銳化的新形势，在1928年后半年，創造社还先后編刊过旬刊《日出》和周刊《文艺生活》，但也都只能出几期，即遭禁止。《創造月刊》也在种种阻碍和摧殘下被迫停刊。新出的单行本或遭禁止或被沒收。沫若的新著作也不能发行。我的第一部集子《抗争》一出书即遭通令禁止。敌人的压迫越厉害，我們的书刊越受讀者的欢迎，而我們的斗争也越巧妙，利用种种方法把新出的书刊送到广大讀者中去。但我們預料敌人最后終会伸出殘酷的毒手扼杀創造社，我們准备开辟第二战场以便創造社封閉后运动不致中断。“江南书店”就是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成立的。創造社被封以后，全部书籍的紙型都移交“江南书店”繼續印行。此外，在出版部門市部的樓上还成立了“上海咖啡店”，一方面作为文艺界接头、談話的场所，一方面也可以起耳目的作用。創造社被封的时候，創造社成員沒有受到当场逮捕的危险，就因为“上海咖啡店”方面及时通知的原故。这些未雨綢繆的工作应多归功于仿吾。他不单筹划安排，并且提供資金，促其实现。直到一切就緒，他才出国的。

仿吾出国以后，反动派的摧殘一天比一天加劇，創造社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而张資平和王独清又在内部制造糾紛、增加困难，但我們並沒有畏縮退却，一面对抗反动派的进攻，一面展开了内部斗争，最后张、王二人相继被清除出去了。但，在此前后，沈起予、叶沉、許幸之諸同志从日本回国，給創造社增加了新生力量。叶沉（原名沈学誠）和許

幸之都是专攻美术的，并在日本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对于中国的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和新的美术活动都曾作了一定的贡献。

創造社虽然不断地受到反动政府的压迫，但它的活动更加开展，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夫妇为了吸收青年学生，要求創造社合作。校长周劲豪曾留法学过美术，他又是广东资本家的后代，有錢財、有房产，就在自己一所大公馆里办起了上海艺术大学，专教繪画，但是学生寥寥无几。他看到創造社在文艺青年中很有影响，便自己找上门来，要求合作。創造社本来也想从事教育工作，深入广大学生群众，扩大影响，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在党的大力支持之下，我們就同意了，全力投身这一項新的工作。在上海艺术大学里面，我們开设文学、美术和社会科学三个系，課程全部由創造社同人分担。我和乃超、初梨、起予諸人負責文学課程，彭康、鏡我和李鉄声負責社会科学系，美术系则由叶沉和許幸之包干。招生广告一登出去，学生纷纷投考，打破了該校历来的寥落局面。校长夫妇非常高兴，我們也很兴奋。学生大都是进步的，其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大革命，有的还有党、团組織关系。开学以后，学生听讲都很热心，师生关系密切，政治空气特别浓厚。法租界電車工人罢工，学生曾募捐援助，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注意。一天早晨，正上課間，法租界巡捕房派大批巡捕包围学校，当场捕去学生数十名，其中有学生会的負責人。我和沈起予正在上課，也当场被捕。校长周劲豪不及走避也遭株連。我們都被拘留在卢家灣巡捕房的地下暗室里。校长夫人托人請来法国著名律師辩护，捕房沒收了几百元的保押金才把我們三人释放了。学生則陆陸續續被保释出来，有的被拖得時間很长。周劲豪夫妇从此害怕了，对我采取了冷淡态度，对学校也表示消极了。他們不甘心給捕房敲詐了几百元，便停发我們的薪給，只有王独清例外。王独清因为曾和周劲豪同为留法生，担任教务主任，負責联系工作，他便利用这种关系，向周氏夫妇私下通融。学生看见学校这种半死不活的情况，有的便自动离校，有的轉校，不到学期終了，学校就完全停頓了。創造社在上海艺大教学的時間虽不很长，但是絕大多数的学生都受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不少人更进一